

回港易，掂

前些日子看到網上有一篇文章說「回港易」不易，內容大致是關於一位身居在廣東的港人因為到非特區政府認可的機構做核酸檢測，從而導致人到了關口之後不能使用「回港易」。這篇文章在內地港人的圈子有一定的閱讀量，然而這是一個個案，至少從我個人的親身經歷來說，「回港易」是極為便利的。

依依不捨，在內地前後隔離加「自由活動」一個多月之後，我終於踏上回港的行程。由於在北京待足了十四天，因此按照「回港易」計劃，我只需在北京找一家符合條件的檢測機構做完核酸檢測後即可回港。

任何政策在執行時難免遇到實際問題。使用「回港易」之前，我還擔心會遇到十分繁瑣的程序，其實並不然。「回港易」的安排頗貼心，當你預約成功之後，特區政府會分別在你登記成功的當天、行程出發前的三天以及出發當天，多次通過短訊發送具體的回港流程到你的手機，並附帶鏈接。

若無法按照「回港易」要求做好準備的人，其實也要自我反省一下，畢竟該計劃給予了充分的提醒和處理時間。用手機操作，約十分鐘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登記步驟。成功使用「回港易」，其中兩步至關重要：一是到認可的檢測機構提前做好檢測，並備好陰性結果的紙本報



香港國際機場分流不同類型的港人入港的區域。作者供圖



HK人與事 承言

告；二是預先在衛生署網站上做受健康申報。完成這兩件事，基本上可順利登上回港的航班。

特區政府對於「回港易」安排的細心，不只體現在登記程序上，還有對抵達香港後的「回港易」人士的防疫安排。在抵港之後，使用「回港易」的人士和其他抵港人士基本是分流的，「回港易」人士使用一個擺渡列車的車廂，登記、檢測以及休息等候核酸結果都與其他抵港人士分隔在不同區域。此舉顯然是為了盡量減少兩者的接觸，降低病毒傳播的風險。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核酸檢測結果需要等候二至四個小時，以及「回港易」人士與其他抵港人士被安排在同一層。

從歷經在內地二十一天的隔離，再到使用「回港易」返港，這一趟旅程讓我印象深刻。最深刻的感受是終於明白為何內地的疫情能夠控制成功，同時防控部門也沒有絲毫的鬆懈。在我到過的地區，無論北京或廣東，進出公共場所都必須出示獲認可的健康碼，外出使用交通工具掃健康碼自不用說，更有專人監督乘客是否佩戴好口罩；使用手機程式Call車，網約車的司機全部都顯示已接種疫苗。從源頭到傳播鏈，內地的疫情管控工作相當精細，這是香港需要借鑒學習的地方。



人生在線 于媛澄

十幾歲的日常，無非上學，放學，功課，溫習。面對校園，有時候確實想躲進被窩裏，拚命地去逃。

校園是個挺奇怪的地方。聖誕派對總是要寫卡片，運動會和學校旅行時總是要看誰拍的合照多。如果說，兩三張照片是留念，那二三十張就是壓力了。當照片的數量變成了一種炫耀的資本，其實就喪失了拍照本來的意義。但我也明白大家其實都只是希望拚命留下回憶，想為自己的青春留下腳印罷了。於我而言，比起一堆人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其實我更喜歡躲在家裏，看看電影小說，聽聽音樂，做白日夢；但比起無人居住的世外桃源，我又更喜歡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的市中心。作為一個喜歡在熱鬧的地方求獨處的人，到底是我太奇怪，還是校園太奇怪呢？

不過，拋開無奈，學校裏的一點一滴確實挺有意思的。我在學校的足跡說不上有多深，但應該也算是個獨一無二的小腳印。在這個校園裏，從新生到學生會主席，從台上的聽眾到台上的常駐司儀，使命感滿滿，直直地站着；又挽過小夥伴的手大步流星，走遍學校每一個小角落，笑得前仰後翻；試過

有抬起頭四十五度角，扁起嘴角不讓眼淚掉下來的時刻；又或許，還有甜蜜地揚起嘴角的瞬間。

說起中學時代，大概也少不了那甜甜的爱情。每次看到這種十幾歲的戀愛，我都會搖搖頭。有人形容它就像小時候青澀的英雄夢，但真的青澀嗎？中學六年，有些人的對象轉換不斷，而所謂的另一半，是不是就真的只是站在你身旁的「另一半」，僅此而已呢？明知這段感情無法長久，但還是為了那小小的甜蜜和虛榮心，飛蛾撲火，這或許也就是少年。

我們會需要的越來越多，然而擁有的只會越來越少。當然早戀不一定就是錯，兩個少年在一起也許沒有什麼錯對，只是沒有能夠支撐起少年們在一起的東西，那才是錯的。

六年的中學小火車也還有一年就到站了，如果你問我以後會懷念嗎，我想我會回答：「會的吧。」我會懷念海傍冰冷的海風拍打着臉頰，把頭髮吹得亂糟糟的感覺，也會懷念那個七點四十四分飛奔跑到校門前，身上殘留的全是馬路邊烤紅薯、烤栗子油煙味的中學時代。那些日子可能沒有那麼特別也沒有那麼絢爛，但一張一張臉孔會永遠清晰，如同看清指尖上的細紋那般，滲透着快樂和憂傷。

《你的少年念想》的作者不朽說過，在這個匱乏的年紀，或許只要一點點的甜，就足以成為對抗這個世界的勇氣。所謂的青春，應該就是對美好的盼望。

我覺得很對。

直到有段時間，我也開始害怕長大了。對於未來，對於死亡，我也開始感到恐懼了。哎，這個年紀的小人兒，也會像我一樣，白天熱烈地憧憬着長大後的生活，到了深夜卻被變成大人的恐懼嚇得哭泣發抖嗎？

於是在網上搜：害怕長大怎麼辦？有人說：「不要想太多也別害怕，很多時候，有些你心裏疑問會在你未來成長的某一刻突然醒悟，因為你還小，很多事情都沒經歷，你現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努力當下，努力做好這個年齡段應該做的事情，不要給自己留遺憾。」

我一看，一下子釋懷了很多。

嘿，懵懂的少年，在陽光照耀下，腳踏實地走好每一步吧，到了那個年齡，自然會懂那個年齡的道理了。只是不知道多年後的你看到那條從地鐵站一直走到頭的路，會不會記得有幾個女生，邊走邊手挽着手，拿着筆記溫習的日子呢？

無論如何，我相信回憶在歲月的痕跡裏，總能沉澱出珍貴的樣子，因為我們都曾努力走過。

誰是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上)



文化經緯 常樂

誰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答案是明確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時全國的五十三名共產黨員，誰居其中之一，誰就是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員。

那麼，誰是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在最早的五十三名中國共產黨員中，有香港人嗎？如果有，他就是香港最早的共產黨員！

香港，作為近代中國遭受外國侵略最早、受壓迫最酷、近代工業及其產業工人出現較早、規模較大且西方新思想傳播較快的一個地方，從理論上確實會出現得風氣之先的先進人士，從大家對於香港為民主主義革命所作出突出貢獻的認知來看，有港人出現在最早一批共產黨員的行列也應該不足為奇。

在中國最早的五十三名共產黨員裏面，確實有一位從香港走出去的先進青年，他就是袁振英。袁振英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正正一年的時間裏，協助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先後參與創建了上海、廣州的共產黨小組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因此，在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二〇一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在敘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過程時，兩次提到袁振英的名字，充分肯定了他對創建中國共產黨所起到的歷史作用。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袁振英對中國革命、對中國人民所作出的歷史貢獻。

然而，很多人都對袁振英這個名字比較陌生，不了解其貢獻，也不知其大致履歷，讓我們走進這位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吧！

袁振英，別名仲勳，筆名震瀛、震寰等，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生於廣東省東莞縣溫塘鄉（現東莞市東城街道溫塘社區）。

袁振英受家庭薰陶，自小就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情感。其父袁居敦是一名塾

師，經常以其先祖袁崇煥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子弟。正如袁振英所說：「我們常常想起祖宗袁崇煥督師，忠義便油然而生了。」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在香港求學，形成了其民主革命及無政府主義思想。一九〇五年，其父袁居敦攜妻兒到香港謀生。袁振英即先後在香港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讀書，接受西式教育，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袁振英在香港皇仁書院讀高中期間，結交東莞籍學長李文甫、林直勉等，受到他們的反清革命思想影響。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廣州黃花崗起義爆發，其中李文甫中彈被俘，慷慨就義。袁振英為自己年少未能直接參加這次起義而深感惋惜。一九一二年底，袁振英在香港皇仁書院與同學杜彬慶、鍾達民等人組織了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大同社」。大同社主張無家庭、無國家，提倡世界大同，與廣州劉師復成立的心社遙相呼應。從此，無政府主義成為影響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從香港皇仁書院畢業，考入中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英文門（慣稱西洋文學系）學習。一九一七年底，袁振英又考入北大文科國文門的研究生。

在北大讀書期間，陳獨秀、蔡元培、辜鴻銘、胡適等是其尊敬效法的老師。受陳獨秀影響，參與《新青年》雜誌的投稿及開始關注蘇維埃社會主義思想。一九一八年畢業後，袁振英先後在廣州、菲律賓、香港等地從事教書和媒體工作，在菲律賓組建華僑工黨，還發動省港媒體記者組成「廣東遊東（日本）記者團」，到日本、朝鮮、台灣等地宣傳反對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草案。

一九二〇年七月，袁振英結束廣東遊東記者團工作來到上海，適逢陳獨秀脫離北京大學在上海籌組共產黨小組，袁即接受陳的邀請幫助編輯《新青年》雜誌和籌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〇年八月，正是在上海的《新青年》雜誌編輯



《袁振英傳》介紹袁振英生平事跡。資料圖片

部，成立了當時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任書記。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先後有十七人加入共產黨小組，他們是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慮、楊明齋、施存統、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同月，上海共產黨小組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任書記。這是中國的第一個青年團組織，袁振英是創始人之一。當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起者有八人，他們是俞秀松、施存統、沈玄慮、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團務由施存統、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主持，團址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

除參與創辦上海共產黨小組，袁振英接受組織派遣，擔任《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編及《共產黨》月刊編輯，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作出突出貢獻。身為這個專欄的主編，袁振英的翻譯與編輯工作非常繁重。據統計，「『俄羅斯研究』專欄共刊出介紹蘇俄的譯、著三十八篇，其中譯文三十五篇，震瀛署名翻譯的就佔了二十四篇。第八卷第四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的十三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譯。」這個「震瀛」，正是袁振英的筆名。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最後，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

一九三五年，張學良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指揮十六萬東北軍聯同陝西楊虎城的西北軍和湯恩伯的「中央軍」，圍剿陝北的紅軍，但屢遭挫敗。東北軍久厭內戰，心懷怨望，亟欲恢復東北。其實自東北淪陷後，熱河易手，張學良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非議，「不抵抗將軍」的心理負擔越來越重，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張學良不支持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反認為「先攘外、後安內」，並贊同中國共產黨號召「聯共抗日」的主張。

一九三六年四月，張學良親至延安與周恩來會談，中國共產黨主張「反蔣抗日」，張學良主張「聯蔣抗日」，互有分歧。五月，中共提出「逼蔣抗日」，張學良表示贊同，雙方達成《抗日救國協定》，希望國共能再次合作以抗日。張學良遂停止對紅軍的圍剿，並找機會勸告蔣介石聯共抗日。

十月二十日，張學良秘密前赴山西太原，向閻錫山坦述自己聯共聯蘇以抗日之事，閻錫山亦答應勸蔣介石聯共，「倘蔣不幹，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紅軍、東北軍全力抗戰」，並表示把固陽等五個縣讓給紅軍。二十二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介石

拒絕。二十九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再遭蔣拒絕，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

十二月二日，張學良再抵洛陽，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請求蔣介石往西安會商。蔣抵達後，入住華清池之西京招待所。十二月七日張學良對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再遭蔣嚴拒，並謂若不進攻，便把東北軍、十七路軍分別調往福建、安徽。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蔣介石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同日晚上，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其部隊的高級將領，宣布十二月十二日清晨進行兵諫。

十二日上午五時，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十數要員拘押，旋即通電全國，提出八項要求，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強調「必須堅決採取以和平方式解決事端的立場」，中國共產黨遂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到西安調停。經蔣介石、張學良、周恩來三人會談後，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隨蔣介石返南京接受軍事審判。國民政府任命李烈鈞為審判長，張學良被判以「首謀叛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後獲特赦，惟自此遭軟禁，直至一九九〇年才全面恢復自由。



動言集⑧ 蘇銳鴻

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破裂後，內戰連年，使日本有機可乘。西安事變促使國共再次合作。經過多次磋商，終於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國共聯合抗日，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

絲綢之路上的生靈



市井萬象

「萬物生靈：絲綢之路上的動物與植物」展覽現正於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行，展品來自全國十四間文博機構和企業。圖為醉拂林駱駝駱駝。展期至九月五日。



中新社